

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

民族出版社

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

陶 柯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陶柯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2

ISBN 7-105-08062-0

I. 论... II. 陶... III. 藏族—民族文化—影响—汉族—民族文化—研究 IV. ①K281.1②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008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照排中心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 7.75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 14.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发行部电话:58130509)

作者简介

陶柯，男，汉族，1944年4月生，原籍甘肃省临夏市，196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长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94年至2003年在甘肃省合作民族师专汉语系任教，兼任《甘肃高师学报》副主编，并担任过汉语系主任、甘南州政协常委，职称教授。2000年曾获得曾宪梓奖，2001年曾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2003年曾获得甘肃省民间文艺十年奖二等奖。发表论文数十篇，散文、通讯、诗歌等近百篇。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南滨河东路9—25号

联系电话：0931—8984906

0930—6213589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陶柯先生是甘肃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系教授，在甘南藏族地区从事民族教育工作长达 40 年之久，他在工作实践中与当地藏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亲密交往中亲自观察和体验了藏语对临夏方言、藏族民歌对洮岷和河州花儿的影响等，故确立了《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这一课题系甘肃省 1998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并得到资助。它具有开拓性，以往学术界较多谈论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很少论及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或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历史上各民族间友好往来、文化交流，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而藏族文化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者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虽仅从语言、艺术、服饰、文体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但论题新颖独特，论据充分确凿，论证清晰严密，说服力很强，是一本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因此，我们深信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藏族文化，对推动藏汉文化交流、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族出版社

2006 年 9 月 5 日

有关专家对本书的鉴定意见

西北师大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赵逵夫先生的鉴定意见

陶柯先生的《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课题，以前尚无人涉足。陶柯先生选定几个重要的方面予以深入探讨，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论证充分，翔实可信，对于西北、西南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成果完成了原项目计划预定的研究内容，达到了省社科规划项目的预期目标，在目前来说，是一项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成果。

赵逵夫

2001年11月22日

西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伏俊连先生鉴定意见

陶柯先生的《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是1998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第一，这个选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学术界过去更多的是谈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的

影响,事实上汉藏两大兄弟民族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是相互影响的,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汉族文化也产生过重大影响。所以选题本身就有填补学术领域空白的价值。第二,经过多年的研究,作者已完成了系列论文10篇,其中8篇在省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并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这在省社科规划项目中是完成得很好的,反映了作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待省级项目的高度责任心。第三,就完成的10篇系列论文看,内容涉及汉藏文化的诸多领域,如语言、服饰、体育、音乐、舞蹈、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多角度论述了自古以来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如发表在《中国藏学》上的《论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一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藏族文化对广泛流行于大西北地区的花儿的影响。文章首先指出花儿受藏族民歌的影响而产生及其形成的过程,接着对花儿从音调、语言结构、比兴手法、情感表达的方式等方面所接受的藏族民歌因素进行分析比较,论证本论题,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作为具有开拓性的选题,本项目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涉及面广泛,从横的方面作了较好的清理。但在纵的深度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因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可能在十余万字的论著中论述清楚,也很难凭一个人的学识和精力圆满完成。

因此,我认为,本研究成果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很好地完成了省社科规划项目。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伏俊连

2001年10月1日

原甘肃省藏学研究所所长、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授王洲塔先生的鉴定意见

陶柯先生的《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这一科研成果，多学科全方位地深刻论述了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论题新颖独创，论据充分确凿，论证清晰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弥补了我国藏学研究的一项空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该成果有助于人们了解藏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建议略作补充，并予以经费资助，以专著形式早日出版面世。鉴定等级为甲等。

甘肃省藏学研究所 洲塔

2001年10月5日

专家组鉴定结论

陶柯同志的《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从文学、艺术、服饰、体育、交通等方面探索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并从历史上几个大的历史事件中去观察这一问题，有不少方面具有学术的创新性。论证严密，材料翔实、充分，是西北、西南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以往研究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影响者为多，而此课题成果较少见）。但作者所涉及的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将来还可以作后续研究。

鉴定组负责人 赵逵夫

2001年11月22日

自序

藏族是一个世代生活在祖国西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的勤劳善良而又智慧刚毅的民族，也是一个历史和汉族同样悠久，文化和汉族同样高度发达的民族。我出身自内地一个贫困的汉族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上了西北师大，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但作为一名汉族知识分子，小时候，我对藏族是非常陌生的，甚至有一种神秘感。1966年西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我主动报名来到甘南工作，才使我与甘南藏区和当地藏族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才渐渐熟悉了藏族。

我先后在夏河县藏族小学、夏河县甘加乡卡儿昂小学、夏河县上卡加乡七年制学校、夏河县中学、合作民族师专汉语系任教，中间也曾几度调到最基层乡村搞过行政工作。为了完成行政工作任务，我以工作组长的身份多次深入最偏僻最边远的农牧区，曾经四次翻越云雾弥漫山顶积雪终年不化、道路艰险难行的尼石山，曾经骑马随同九甲乡藏族民兵到过又一个又一个山间牧场，曾经连续十多天跟最贫苦的藏族群众围着牛粪火炉吃没有放一小疙瘩酥油拌成的干糌粑，曾经走遍山路崎岖的上卡加乡的村村寨寨动员藏族儿童上学，也曾经在严寒的冬天在卡儿昂小学破旧狭小的教室里给藏族农牧民办过夜校。

在长期地同藏族群众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我粗通了藏语，一

度曾达到日常生活藏语不需要人翻译的程度。同时，我也感受到藏族人民极其热情、淳朴、诚实、厚道、刻苦、善良、乐于助人的美德。在我下乡经过牧场时，藏族阿爸为保护我冲在前面抡打狗棒奋勇打狗；在卡儿昂我吃水特别困难时，几位素不相识的藏族姑娘主动为我背水；在我每次下乡饥肠辘辘来到藏族群众家中时，好客的藏族大妈总是热情慷慨地给我端上香喷喷的奶茶和糌粑……这一切一次次地使我十分感动，永远铭刻在心中，也使我对藏族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我对藏族文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不了解到逐渐了解，由浅入深的过程。开始，藏族人民所讲的藏语，所穿戴的服饰，所住的帐篷、房屋，所陈列的室内摆设，所吃的酥油糌粑，使我感到特别新奇；藏族青年男女所跳的藏族舞蹈使我心驰神往；藏族骑手在草原上骑马驰骋时所唱的拉伊情歌使我陶醉其中；那闻名中外的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院的宏伟壮丽更使我惊叹不已。

但是，由于我初到甘南的那个年头是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文革时期，由于那个时代的影响，当时我对藏族文化仅仅有所了解而已，还没有认识到更多更深的方面，更没有认识到它的崇高价值。我真正认识到它的崇高价值是我们党结束了文革时代，清除了文革所造成的极左思潮影响并逐步落实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之后。

在我之前，许多学者已对藏汉文化交流作过许多研究，出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方面，很少涉及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有些尽管涉及到了，但也是一鳞半爪，浅尝辄止，没有一个作过全面系统的研究。由我独创的这一科研课题第一次将藏族文化对汉

族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我有时想，由我而不是别人创立这一科研课题，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说其偶然，是因为我悟出这一科研课题的确带有偶然的性质。有一次我乘车从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市去临夏，出了土门关，有两个地名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刁去”和“加唐”。这两个地名明显是藏语，“刁去”和“加唐”在藏语中分别是“石头河”和“喝茶”的意思。这里现在没有藏族居民，多半为汉族，我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这两个地名是明显受到了藏语的影响。我由此想到我的家乡话——临夏方言可能受到了藏语的影响，于是我顺藤摸瓜寻找大量例证，从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将藏语对临夏方言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出了我有关这个课题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谈藏语对临夏方言的影响》。通过这篇论文的写作，我明确意识到藏族作为世代繁衍生息在中华这块广袤沃土上的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几千年来，其发展历史一直同汉族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并在文化上相互不断给以巨大影响，共同创造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一方面，汉族将自己的先进文化不断传播给藏族；另一方面，藏族也将其独特的文化不断传播给汉族，丰富了汉族文化，给汉族文化以一定的影响，藏语对临夏方言的影响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肯定还有更多方面。于是，我便大胆地确立了一个科研课题《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并进行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使我惊喜的是我的上述推断很快得到证实。我通过研究发现，除藏语外，藏族文化在服饰、习俗、饮食、建筑、文学、音乐、舞蹈、交通、医药、宗教、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都对汉族有影响，而且有些方面如藏传佛教对汉族的影响还是特别巨大的。同时，这种

影响不仅历史上存在，今天仍然存在，如在音乐、舞蹈方面今天影响还越来越大。我完全相信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将来也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

说其必然，我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在我身上交汇的结果：

一、我本身是汉族，出身自内地汉族地区，受过汉语言文学专业方面的高等教育，毕业后又从事汉语言文学方面的教学几十年，应该说对汉族文化我是非常熟悉的。

二、6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工作，同藏族人民有了密切接触，在跟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同时，也对藏族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三、长期的古代汉语教学使我有比较高的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可以不费力地从包括二十五史在内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吸取有关的材料。

四、进入高校后长期搞科研特别是从事学报工作的经验，使我很自然地将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并进而提出这一科研课题。

我想，假若我不是汉族知识分子，又没有在甘南藏区长期生活的经历，是绝对不会创立这样的科研课题的。

1997年我正式向上级部门申报了《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这一科研课题，立即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当年被确立为甘肃省教委科研资助项目。1998年又被列入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受到资助。经过本人不懈努力，到2002年9月我基本完成了这一科研项目，并通过了以西北师大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赵逵夫先生为组长，以该院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伏俊连先生和甘肃省藏研所所长、教授洲塔先生为组员的三人专家小组的鉴定验收。该专家小组给本科研成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赵逵夫先生在鉴定结论中指出：此一成果“有不少方面具有学术的创新性。论证严密，材料翔实、充分，是西北、西南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以往研究汉族文化对藏族文化影响者较多，而此课题成果较少见）”。伏俊连先生指出：“这个选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有填补学术领域空白的价值”。洲塔先生除指出该成果“弥补了我国藏学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外，还特别强调指出：“同时该成果有助于人们了解藏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002年9月5日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给本人颁发了验收合格结项证书。

本科研究成果由17篇系列论文组成，其内容涉及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影响的诸多方面，如语言、服饰、体育、文艺、音乐、舞蹈、医药、高原交通、古籍翻译、西域历史、藏传佛教、汉族藏化、敦煌文化、中国古代文明等。其中大多数论文已在省内外学术刊物，如《中国藏学》、《民族古籍》、《安多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甘肃高师学报》上发表过。其中《论藏传佛教对汉族的影响》一文，2001年获甘肃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论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获“甘肃省民间文艺十年奖”二等奖；《藏族体育对汉族的影响》获四川省“烛光教育学科奖”。

国内一些著名出版社对其中一些论文很感兴趣，已将其载入他们出版的一些大型文集中。例如，《论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一文，已收录到北京《中外产业科技月刊》社主编的大型文集《跨入21世纪的辉煌篇章》；《论藏传佛教对汉族的影响》一文，已被载入北京两家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两部大型文集《民族的辉煌》和《奋斗的中国人》。

本人创立该科研课题的目的除了向人们介绍自古至今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外，旨在促使今天汉藏两大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本科科研课题的系列论文发表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应：

首先，它得到国内许多著名藏族学者和一般藏族读者的肯定和好评，在甘南藏族文化界反应尤其强烈，一致认为它实事求是地不带民族偏见地弘扬了藏族文化，使藏族群众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许多以前我素不相识的藏族学者和名流甚至向我表示衷心感谢。如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联主席兼藏文版《达赛尔》总编尕藏桑吉深情地对我说：“陶教授！我们州内和省上的藏学专家对你的藏文化研究十分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大家都对你十分尊敬十分感谢，认为你对宏扬藏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你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事实求是的研究藏文化的专家。”2004年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与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联合举办的“安多藏区文化面向21世纪研讨会”上，向与会代表全面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这项科研成果后，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与会的藏族代表纷纷前来同我握手，表示感谢。青海师范大学民族部桑吉加教授对我深情地说：“陶教授！你的报告太精彩了，太感人了！你的研究非常有意义，我们代表藏族人民向你表示感谢，藏族人民永远忘不了你，祝你长寿！”

其次，许多汉族学者和读者也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从中了解到藏族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了解到藏汉文化相互影响的情况，增加了在这方面许多先前闻所未闻的知识，从而产生了对藏族文化的崇敬感，激发了他们进一步学习藏族文化的热情，加强了对兄弟民族藏族的了解和友好感情。例如2003年和

2004年我曾经分别给兰州师专和兰州大学学生作过有关报告，学生反应强烈。2005年我给兰州师专两个班共200多名学生专门开设了有关选修课，课后听课学生反应非常强烈。学生魏娟妮说：“长期以来受传统习惯和文化的影 响，汉民族本位情结比较盛行，自从学习了这门课，这种情结受到了打击，带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震撼与清醒，也是一种欣慰与骄傲。”学生杨龙说：“通过学习这门课，我感触很深，让我对藏族这个民族有了深刻的认识，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外知识，而且也让我对藏族文化有了全新的了解。”

本科研课题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不少省内外藏学专家和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有合作民族师专名誉校长、教授、全国著名藏学专家赛仓·洛桑华尔丹先生，甘肃省藏研所所长洲塔先生，西北民族大学藏语系副主任扎布先生，合作民族师专副校长、教授道周先生，甘南州文联主席尕藏桑吉先生，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正如赵逵夫先生所指出的，《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这一课题“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需要有很多人的参与和长期不懈的努力”，而另一方面，本人由于长期以来教学和行政事务匆忙，加之科研经费不足，很难深入实际，作更加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又由于我不懂藏文，难于直接阅读那浩瀚的藏文文献，因此本书肯定存在许多疏漏和缺陷，敬请读者谅解。

如果时间和其它条件允许，我愿意继续作这方面的研究，写出更多更好的论文，把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影响的更多方面介绍给人们。同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将这一很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以便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为民族

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服务。

应该说明一点，本书所指的文化，既指狭义的文化概念，也指广义的文化概念，而广义的文化概念跟文明的含义差不多。

我还要告诉读者的是：本书尽管篇幅不长，但包含了本人十年艰辛的努力，写出以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今天世界上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新书出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不少书肯定会被人们很快遗忘，但我相信我的这本薄书是不会被人们轻易忘记的，因为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独具特色、魅力无穷的藏族文化给它以强大的生命力。

最后，令我欣喜的是本书出版之际恰逢青藏铁路胜利通车之时，我借此机会向历尽千辛万苦修成这条铁路的建设者们表示崇高敬意，同时希望正如这条铁路能带领人们去游历西藏那样，我的这本书也能够帮助人们了解藏族文化。

甘肃合作民族师专汉语系教授 陶柯

2006年6月

内容简介

《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共由 17 篇学术论文组成。这 17 篇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论述了自古以来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内容涉及汉藏文化交流的诸多领域，如语言、服饰、体育、音乐、舞蹈、文学艺术、高原交通、古籍翻译、西域历史、藏传佛教、敦煌文化、中国古代文明等。

一、《谈藏语对临夏方言的影响》一文，通过考察藏语对西北地区主要方言之一——临夏方言的影响，论述了藏语对汉语的影响。作者根据自己调查所得的大量的实例，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谈了藏语对临夏方言的影响，并分析指出了其影响巨大的两个原因：其一，从历史渊源看，临夏本为藏族先民居住之地；其二，从地理位置看，临夏毗邻辽阔的藏区。

二、《论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一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藏族文化对广泛流行于大西北，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的河州花儿的影响。文章首先指出花儿受藏族民歌的影响而产生；接着通过将花儿与藏族民歌加以比较，指出花儿从音调、语言结构、比兴手法均受到了藏族民歌的影响；又列举事例说明花儿从词汇到语法受到了藏语的影响；最后分析指出花儿所表达的爱情观念特别直率大胆，不同于内地一般民歌，究其原因也是受到了藏族文化的影响。